

汪曾祺信件选登

第一封信(1987年4月2日)
徐正纶同志:

3月13日信我于前日才收到,邮递如此之慢,真不可解。

读信,深为你对编辑工作的认真、细致而感动,谨先表示我的谢意。提出的问题,分别答复如下:

一、《花儿的格律》,可均照你们的意思改过。你们所改处均与“节拍”“用韵”无关。

二、《关于小说语言(札记)》引用刘大槐说,确有错字。“一神气,文字是最精处也”当作“文之最精处也”。“作文若字句安顿不妙,岂有文字乎”,“文字”不误,但“岂”字下脱一“复”字。

《读民歌札记》引俞正燮《癸巳类稿》条的标点有误,但我的《癸巳类稿》,不知被家人捆在哪包书里去了,一时找不到,无法复核原文。现在只好把脚注的最后几句删掉。

《小说笔谈》引齐白石诗“比翁无肝胆”,“比”应是“此”;“空员一千年”,“员”应是“负”。

三、《外星人语》,似可不改。

四、《林斤澜的矮凳桥》,我原也想补收进《文谈》,怕赶不上你们发稿,故未提起。既然你们拟收入,很好。这一篇可放在评论一辑的最后。《文艺报》刊出时有个别错字,但我那一期《文艺报》找不

着了,你们可先照着那样发,等我找出《文艺报》,勘出错字后再写信告诉你们。

版式、装帧,由你们决定吧。如果能用大32开,最好,题目若能多占几行,则“宽松”些。封面我想你们不会搞得太洋。过于现代派,与文字内容不相合。如用底色,希望不要用墨绿的。我的两本小说集的封面都是墨绿的,出版社提出的理由是:这和作者的年龄相称。真怪。斤澜把文稿交给你们时,夹进我自己手写的书名,不一定用我手写的字,那几个字也写得不理想。

你的信是从北京发的,但我想你人还在杭州,此信仍寄杭州。即候文安!

汪曾祺 四月二日

第四封信(1987年6月4日)
徐正纶同志:

5月28日信收到。
《晚翠文谈》校样,斤澜尚未交给我,今天我打电话问问他。

“蔼蔼远人村”,“蔼蔼”确当作“暧暧”。

P129、“古人论诗之云”,“之”字当删去,“云”字下可加冒号。

P131、“打渔杀家”,“渔”可统一为“鱼”。

P273、“钢管”不误,“铜管”是误排。

承细心勘校,甚谢。一校样待斤澜交来后即抓紧看。即致敬礼!

汪曾祺 6月4日

第五封信(1987年6月6日)
徐正纶同志:

斤澜已将《文谈》副校样转给我。我粗校了一遍。后一部分有些缺字,未暇一一校补。这个一校样错字不是很多。在你的精心审阅下,我想基本上可以把错字消灭,——一本书完全没有错字,是不可能的。我相信书出之后,看起来会很愉快。谢谢你!

副校样中的一篇《浅处见才》,你复校后能不能寄还给我?我月底要给剧院的青年编剧讲一次课,想大体上就讲这些内容。如有此副校文本,即可不用备课了。副校另函挂号寄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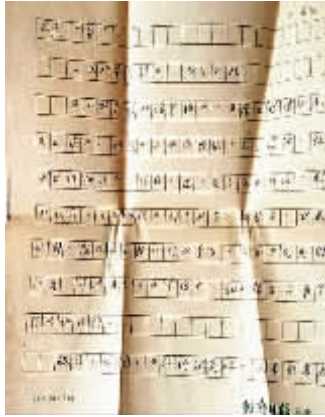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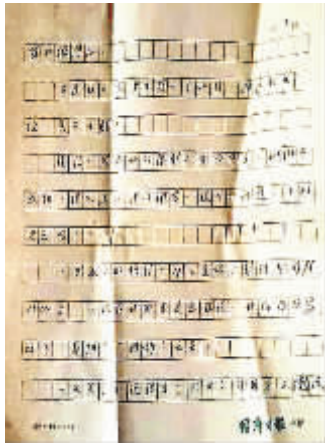
样书何时可出?我大概要到十二月才能看到,因为我9月—11月要出一次国。

即候 编安!

汪曾祺 6月6日

第九封信(1988年3月24日)
徐正纶同志:

3月18日信收到,你寄来《晚翠文谈》一本也收到。前一天编务室已寄来样书20本,请转告编务室。



汪曾祺先生于1987年4月2日写给徐正纶的信

我想买200本,好送人。请代办一下手续。所需书款,请于稿费中扣除。

一看版权页,印数只2700,我心里很不安,这本书无疑将使出版社赔钱。应该表示感谢的是我。我对浙江文艺出版社肯做这种赔本买卖,深致敬意。

出版社曾寄我一本“校正本”,我粗看了一遍,校出一些错字,另封寄出。总的说来,此书错字不多,我比较满意。

即候时安!浙江还在闹肝炎否,祝无恙!

汪曾祺顿首 3月29日
(信件照片由徐正纶先生提供)

(上接第一版)

我们由于工作需要,在全国范围内接触过各种年龄段的大小小作家。在这些作家中,像汪先生这样年高、资深,以其“散而庄、淡而腴”的独特创作风格在中国文学界享有盛誉的,并不多见,尤其是汪先生曾先后在《北京文艺》《民间文学》等全国著名文艺杂志干过多年编辑工作,对这一行谙熟于心。因此,我曾担心像他这样的作家,可能居高临下,不大好打交道。我第一次写信给他,心中不免忐忑,行文字斟句酌,尽量谦逊更谦逊些。谁料汪先生回信的口气,却是那样的随和亲切,此后我和他再联系时也就放下了心,不再用上许多客套话。如今重读汪先生来信,仍为他的言谈、举止和气度所折服,感触良多。

我们写给汪先生的信,相当一部分是向他请教审稿中发现的各种各样文字、标点差错的。因为书中所收的篇章,大多是在各报刊发表过的,而这些现成剪贴过来的稿子,差错较多,明显的我们改了,对没有把握的,尤其是引述前人著述文字中出现的差错,就写信问汪先生,他对此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答复、指点。比如,1987年4月2日汪先生来信中说到的俞正燮《癸巳类稿》,在《晚翠文谈·读民歌札记》中,他引用了其中的一段文字,并在脚注中标明出处。由于铅印的原稿脱字或错排标点,怎么也读不通。本来,编审者有责任查核原书,但当时我们手头没有此书,又来不及跑图书馆,便写信请教汪先生。不巧的是,他回信说:“我的《癸巳类稿》,不知被家人捆到哪包里去了,一时找不到,无法复核原文。”这时,他完全可以把“皮球”踢回来,但他没有这样做,而是提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,既避开差错,又不影响引文应用,那就是干脆“把脚注的最后几句(即脱字或排错标点的那几句——笔

者)删掉”。我们接到回信,很感谢汪先生对于勘校书中的差错勇于担当,又能够灵活地变通处理。

为了把这本书出好,我们除了争取把差错率降到最低,还想在装帧设计上动动脑子,为此我写信给汪先生,听取他对这方面的意见。他在1987年4月2日来信说:“版式、装帧,由你们决定吧。如果能用32开,最好,题目若能多占几行,则‘宽松’些。封面我想你们不会搞得太洋。过于现代派,与文字内容不相合。如用底色,希望不要用墨绿的。我的两本小说集的封面是墨绿的,出版社提出的理由是,这和作者的年龄相称,真怪。斤澜把文稿(指请他审阅的《晚翠文谈》排印稿——笔者)交给你们时,夹进我自己手写的书名,不一定用我手写的字,那几个字也写得不理想。”明眼人一看信中的这些文字,应该知道这是一位谙于此道的行家所说的内行话,可是汪先生委婉地采用了商量的口吻、不确定的语气;对自己一些很好的想法,也只是以“希望”的句式提出,把最终的“决定”权谦让给了我们。尤其是对他写的那四个毛笔字书名,却作出了否定的评语。其实,汪先生的书法以其秀丽俊逸在圈内外早就有点名气了,因此我们建议这本书的封面,就请他用毛笔书写书名。虽然他答应我们的要求,在信中附来横竖两式的毛笔书名,却认为“写得不理想”,“不一定用”。读了这封信,我们进一步懂得什么是“大智若愚”,什么是“虚怀若谷”,特别是这一切发生在汪先生这样一位卓有成就的老作家身上,更觉难能可贵。

让我们愧不敢当的是,汪先生在九封来信中,对我们的工作一再肯定,反复鼓励,颇多溢美之词。如1987年4月2日来信说:“读信,深为你对编辑工作的认真、细致而感动,谨先表示我的谢意。”同年6月6日,他在审读《晚翠文谈》一校样后,

来信说:“这个一校样错字不是很多,在你的审阅下,我想基本上可以把错字消灭,——一本书完全没有错字,是不可能的。我相信书出以后,看起来会很愉快。谢谢你!”1988年3月,《晚翠文谈》出版,编务办公室按规定寄“校正本”(即完成本)给作者,请他作最后一次审读,以后寄回存档。汪先生于3月24日来信说:“出版社曾寄我一本‘校正本’,我粗看了一遍,……总的说来,此书错字不多,我比较满意。”说实在话,汪先生大可不必向我们一再道谢,他读了经由我们手出版的著作,能感到“愉快”和“满意”,即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褒奖!

尤其使人难以忘怀的是,汪先生对出版社当时面临的图书市场萎缩,书籍销路低落的严峻形势,一再强烈地表示他的忧虑和关切。他在九封信里,多次因自己这本书销路不佳、增加出版社经济负担而感到内疚和歉仄。他在1987年7月19日来信中说:“《文谈》年内能出书否?定价2.20元,稍贵,大概买主不会多,颇为出版社赔钱而发愁也。”他在1988年3月24日写的信,说得更明白:“一看版权页,印数只2700,我心里很不安,这本书无疑将使出版社赔钱。应该表示感谢的是我。我对浙江文艺出版社肯做这赔本买卖,深致敬意。”他还在出书后主动提出要买二百本《晚翠文谈》,以表示对出版社的支持,为出版社分一点忧。我想,这大概因为他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老文人(有的评论家说他是“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”),仍然保持着一颗纯真的赤子之心,乐天下之所乐,忧天下之所忧。

汪先生的九封来信,内文尽管简略、琐细,但不仅忠实记录了《晚翠文谈》出版过程中的某些重要细节,而且还有力见证了一位老作家的可贵襟怀和品格。能有机会和汪先生合作出版这样一本书,是我此

生的一大快事!

后续“佳话”

最后,说一段有关《晚翠文谈》的后续“佳话”。

在这本书出版后的第三年(1991年),我请汪先生为我写一幅字,他欣然同意,不久就写好寄来了。难得的是,他这幅书法中的字,不是像大部分书法家通常所做的那样,誊写现成的古人诗词,而是亲作一首七绝,写的就是杭州的风物和他对杭州的怀念。汪先生曾在散文中多次写到杭州,但写杭州的诗似乎仅此一首。诗的原文如下:

桃柳杭州无恙否?
当年风物尚如初。
虎跑泉泡新龙井,
楼外楼中带把鱼。

我想,汪先生对我如此“优待”,可能和我们当年为出版他所在意的《晚翠文谈》曾付出过辛勤劳动,不无关系,他是借此还我们的情。

2013年3月浙江文艺出版社三十周年社庆之际,我整理旧稿,找出汪先生这首七绝。《钱江晚报》消息灵通,很快拿去,在同年4月8日第一次影印发表。记者为此采访我,问起这首诗的来历,这便引出我对出版《晚翠文谈》一书的种种回忆,也就必然连锁引出汪先生给我的这九封信。于是,汪先生的子女和汪曾祺研究界的学者,都知道我保存着这九封未发表的信,一再鼓动我公之于世,并拟收入即将出版的新版《汪曾祺全集》。

我当然高兴这样做。但是,为使人们准确解读这九封信,我觉得有必要对它们的背景和来龙去脉有所交代。这也正是我写这篇短文的初衷。